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

张永丽，郭世慧

（西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使用 2017 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采用 Mlogit 模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务农、兼业、务工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禀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在结构制约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结构中家庭学生数、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公共保障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贫困地区；家庭禀赋；结构制约；劳动力；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9)03－0067－12

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当前中国人口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影响着农村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劳动力表现出更大规模的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迁移且迁移者更倾向于选择务工，迁移特征表现为由劳动力自身短距离迁移向家庭远距离迁移转化的趋势[1]；同时，由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水平快速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2]。在农村内部，社会经济资本进入农村而形成的以企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增多，为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兼业、务工的机会，这使得农村内部农业雇工的现象日渐明显[3]；农村内部分工的细化亦促使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领域转而进入非农领域工作[4]。

家庭在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行就业决策。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与福利供给单位，农户家庭担负着农业生产、生活保障、经济帮助和福利供给等多重功能[5]。劳动力个体作为农户家庭的一分子，其职业选择会明显受到家庭现状的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福利并规避潜在风险，农户家庭会将劳动力资源合理分配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而劳动力个体则是在家庭最优决策前提下，综合考量自身相对优势，做出合理的就业选择。

学者们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研究大多以 Becker 提出的家庭时间配置理论为基础，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市场参与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了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农业与非农领域之间的配置。如：部分学者从个人特征角度分析，研究得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年龄越小越有利于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6－7]；也有学者从农户参与劳动力市场角度研究分析，发现土地、牲畜拥有量对农户非农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8]；部分学者从工资水平和收入角度研究分析，发现随着影子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影子收入的降低，会促进农户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9]；部分学者研究发现

收稿日期：2018－11－29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9.03.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8XJA790009)

作者简介：张永丽(1966—)，女，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E-mial：zhylljp@163.com

社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越高[10]、交通越便利、教育设施越完备[11],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越高。结合家庭特征角度分析劳动力资源配置文献较为丰富,如:部分学者从家庭禀赋角度分析,发现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农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12];部分学者从个人特征与家庭禀赋角度研究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其个人素质和家庭禀赋的双重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素质对劳动力务工选择影响较大,家庭禀赋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对劳动力选择创业的支持作用明显[13],此外,性别[14]、健康状况[15]、技能水平、家庭社会网络与家庭经济资本[16-17]也对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有着积极作用;亦有学者从家庭居住安排角度研究分析,发现不同的居住模式对年轻劳动力外出有显著影响,主干家庭对年轻劳动力外出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核心家庭对劳动力的外出具有负面影响[18]。从家庭特征角度分析劳动力资源配置时,多数学者都加入了家庭人口结构的相关变量,但不够全面。仅有少数学者从家庭禀赋和家庭结构角度较为全面的分析家庭特征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如:部分学者从家庭禀赋和家庭结构角度研究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越好,女性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意愿越强;家庭人口负担越大,照料压力越重,女性劳动供给时间越少[19]。

虽然对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且研究成果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配置的理解,但仍有些许不足:一、学者们主要从家庭禀赋方面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鲜有学者从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两个方面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进行研究;二、由于数据限制,现有文献多是对普通农村农户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少有针对贫困农村农户的研究(劳动力资源是贫困地区农户的核心资源,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脱贫和增收的主要手段)。本文从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两个方面分析贫困农村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关系,旨在更加清楚的了解当前贫困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现状,同时也可以为贫困农村居民脱贫提供政策建议。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从家庭层面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劳动力节约技术的发展,农户劳动力可以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与家务劳作中得以解放,同时也使得家庭性别分工模式被削弱;而子女数量的减少、男女性收入水平差异的缩小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也反映出家庭赡养负担的加重与家庭结构的变迁。因此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面临着家庭禀赋与结构制约双重因素的限制。

(一)家庭禀赋视角与研究假设

家庭禀赋并非是指家庭单一成员的资源状况,而是家庭所拥有的能够被所有成员利用的资源之和,包含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四个部分[20]。同时,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还会受到家庭禀赋状况和家庭决策的约束[21]。总的来说,家庭禀赋的特殊性、复杂性对其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有着密切影响。

社会资本包含社会规范、互惠信任和人际关系网络等方面。家庭掌握的社会资源及其人际关系网络是有效获取外界帮助的重要媒介,较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为家庭劳动力获得一份稳定性较高的工作。已有研究发现,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家庭,能为家庭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求职渠道,且个体的求职经历经验和能力素质也会扩大其职业选择范围[22]。在贫困农村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且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下,务工成为增加家庭收入,快速提高家庭总福利的主要途径。此时家庭社会资本对于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显得更加重要,该影响在劳动力就业选择上尤为明显。例如,若父母双方皆选择外出务工,或亲友中有人在外务工时,其家庭成员更倾向于选择跟随亲友外出务工[23],这是因为,外出劳动力在其工作地点的社会网络能够帮助亲友显著减少其工作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快速获得一份可靠工作,因而家庭成员外出或务工的经历经验对于整个家庭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基于此,提出假设1: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劳动力资源越可能选择非农职业。

人力资本包括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技能培训等，是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同时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能否得到有效利用与家庭劳动分工密切相关。家庭劳动分工在追求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同时也要兼顾家庭成员的未来发展，因此农户家庭在决定由谁承担家庭劳务并负责农业生产和由谁外出务工为家庭增加收入是基于家庭成员间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所确定的。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程度越好、工作年限越长、具有工作技能的劳动力外出就业可能性越大并更容易获得一份非农工作。人力资本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更大，表现为：一、在贫困地区，文化程度对劳动力就业选择影响更加明显，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非农职业。这是因为，在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下，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带来的就业优势更明显，更容易被企业接受，同时较高的文化程度，意味着较好的学习和接受能力，这有助于劳动力扩大职业选择范围；二、若劳动力接受了相关职业技术培训，相对独有的技术本领使得其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也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三、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劳动力供给有很大影响，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社会劳动参与，也对家庭其他劳动力有着直接影响，这是因为当家中有健康程度较差的成员需要他人照料时，农户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能够承担雇佣照料人员的费用，那么家庭中就必须有人去担负起照料的责任，从而使部分成员无法参加工作。基于此，提出假设 2：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劳动力越可能选择非农职业。

家庭经济资本状况会影响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与外出务工成员数呈“U”型关系[12]，即经济条件处于“U”型中部家庭相较于经济条件处于“U”型两端的家庭，其成员外出务工意愿并不强烈，这可能是因为一般而言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以通过自己良好的社会网络、经济支持帮助家庭成员寻求非农工作；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此时快速提高家庭总福利变得十分重要[24]，因此家庭劳动力会尽可能的进入就业市场并选择收入较高的非农职业。在贫困农村地区，家庭收入普遍偏低，绝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处于“U”型的左、中端，故而家庭劳动力倾向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且由外出人员带来的可观收入以及改善生活状况的迫切需求也激励着他们去参与就业并努力寻求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再者，由于政府农用机械的补贴政策，农村农业生产机械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改善，使用机械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可以采用租赁田地的方式扩大生产，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家庭劳动力可以脱离农业转而进入非农领域。基于此，提出假设 3：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越有可能选择非农职业。

（二）结构制约视角与研究假设

结构制约包含家庭居住安排与家庭结构两个部分，可以反映样本主体的居住偏好和发展趋向，“并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指向意义”。当前结构研究主要关注居住模式、年龄结构、家庭赡养负担、家庭非健康人员比例等因素。

居住安排包括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两个方面，本文主要观测样本主体的居住模式。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会因家庭居住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研究发现，若仅与配偶居住，则劳动力求职可能性会增强，劳动时间也会相对延长[19]；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时，会更加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这是因为父母在享受子女提供的经济和精神支持的同时，可以分担照料孙子女和家庭劳务的责任[25]，而与年迈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同住时，部分家庭劳动力需要担负较多的赡养责任与付出照料时间，同时会降低自身的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贫困地区农户家庭收入较低且来源单一，为提高家庭总福利，劳动力会尽可能地寻求工作。核心家庭中若无需要照料的儿女（父母一般将年幼的子女带在身边照料），则其外出务工可能性更高，主干家庭中有老人和孩童的情况下，老人对孙子女的照料会促使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因此，居住模式对于家庭劳动力劳动资源配置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 4：仅与配偶居住家庭、核心家庭对劳动资源非农配置有正向影响。

由于家庭结构包含孩童数、非健康人员数、学生与老人数等因素,故而,劳动力的赡养负担与家庭结构密切相关。当家庭中存在需要照料的弱势成员时,会有部分成员放弃外出务工机会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或兼业,此时的"顾家"成员兼具家庭照料与社会劳动的双重身份。研究发现,家庭需照料成员越多,女性会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对弱势成员的照料中,从而降低其社会劳动参与程度[26]。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农户家庭孩童数明显减少,也改变了家庭结构,独生子女比例的不断增加,也可能意味着子女养老负担的加重,当然各个家庭的实际状况并不相同,最终选择放弃非农工作而留在家中承担照料家庭与农业生产的也不一定是女性。基于此,提出假设5:家庭赡养负担越大,部分家庭劳动力将放弃寻找非农工作。

三、农户劳动力资源特征及变量选择、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该调研在甘肃省14个地级市和自治区中随机抽取10个市的1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共获得1683户、7323个样本数据,其中男性为3911人,女性为3412人。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劳动力的资源配置,剔除了老人、儿童、学生以及非健康劳动力人员的3099个样本,得到有效样本4223个,占总样本的57.68%,其中男性样本为2315个,女性样本为1908个。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从业特点,将研究对象分为务农、兼业、务工、个体三类①,依据劳动力家庭居住模式的不同,将劳动力分为独居家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与其他家庭,因独居家庭户数极少,故而将独居家庭并入其他家庭中。样本家庭特征见表1,样本个人特征见表2。

表1 样本家庭居住模式划分及其主要特征

类型	仅与配偶居住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其他家庭
户数(户)	135	620	745	183
户数占比(%)	8.02	36.84	44.27	10.87
户主为党员、干部身份(户)	21	44	79	17
家中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户)	5	25	26	15
人均耕地面积(亩)	3.83	2.30	2.03	3.06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40.64	22.65	16.81	25.69
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元)	2544.33	1740.35	1334.79	1242.76
人均耐用品价值(元)	3216.48	3231.83	2436.12	3026.23
学生数(人)	—	509	705	98
劳动力数量(人)	115	1456	2206	446
非健康人口数(人)	27	90	219	45
家庭人口数(人)	270	2295	3977	781
劳动力占比(%)	42.59	63.44	55.47	53.46
务工占劳比(%)	14.35	37.82	38.76	34.04
非健康人口比例(%)	10.00	3.92	5.51	7.85
赡养负担	1.31	1.43	1.68	1.47

(二)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从样本家庭特征看,主干家庭在农户家庭居住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在1683户家庭中,有核

① 此处工作人口是指,外出务农人口、务工人口与在企、事业等单位之和。

心家庭 620 户，主干家庭 745 户，占比依次为 36.84%、44.27%。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其他家庭分别为：135 户、183 户，仅占总户数的 18.89%；在家庭人员数量上，核心家庭成员共 2295 人，主干家庭成员 3977 人，占样本总人数的 85.65%，其余家庭类型成员仅有 1051 人，仅占 14.35%。

表 2　样本个体职业选择及其主要特征

职业选择	人数(人)	占比(%)	平均年龄(年)	受教育年限(年)	男性比例(%)	女性比例(%)	已婚比例(%)	平均月收入(元)①
务农	2090	49.49	46.51	4.31	37.99	62.01	95.60	868.93
兼业	483	11.44	39.70	7.06	68.94	31.06	88.41	2787.21
务工	1650	39.07	32.36	8.34	72.00	38.00	64.48	3330.84

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相对较差。户主为党员或干部身份的家庭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 21 户，核心家庭 44 户，主干家庭 79 户，其他家庭 17 户，占比依次为：15.56%、7.10%、10.60% 和 9.29%；家中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家庭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 5 户，核心家庭 25 户，主干家庭 26 户，其他家庭 15 户，占比分别为：10.26%、3.70%、4.03%、3.49% 和 8.20%。从家庭社会关系来看，仅与配偶居住家庭与其他家庭的社会关系优于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

仅与配偶居住家庭经济资本更为丰富。人均耕地面积仅与配偶居住家庭 3.83 亩，其他家庭 3.06 亩，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基本相同，约为 2.00 亩；人均住房面积方面，仅与配偶居住家庭都在 40 平方米之上，核心家庭、其他家庭在 24 平方米左右，主干家庭仅为 16.81 平方米；人均耐用品价值中主干家庭最低仅为 2436.12 元，其他家庭为 3026.23 元，仅与配偶居住家庭与核心家庭都在 3200 元左右显著高于主干家庭、其他家庭；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最高为 2544.33 元，核心家庭次之为 1740.35 元，主干家庭与其他家庭接近且都在 1400 元以下。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劳动力占比与务工占劳比较高，主干家庭的赡养负担最重。在劳动力分布上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依次为：1456、2206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34.5%、52.2%，其余家庭类型共有劳动力 561 人，占比仅为 13.3%；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其他家庭务工占劳比相差不大都在 38% 左右，明显高于独居与仅与配偶居住家庭的 14.35%；家庭非健康人比例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较高为 10%，而其余三种家庭都低于 8%；样本总体学生数 1312 人，主干家庭有 705 人，核心家庭有 509 人，其他家庭为 98 人，户均学生数依次为 0.95、0.82 与 0.54，主干家庭户均学生最高；家庭赡养系数从高到低依次为主干家庭、其他家庭、核心家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系数依次为：1.68、1.47、1.43、1.31，主干家庭赡养负担明显高于其他家庭。

从样本的个体特征看，劳动力资源配置在务农、兼业、务工职业间差异较大，且专业化趋向明显。农户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务农和务工上，选择兼业的人员占比很少。具体来看，样本中务农样本数为 2090 个，务工样本数 1650 个，占总样本比例依次为 49.4%、39.1%，兼业样本数为 483 个，仅占总样本的 11.5%。务工和兼业人员的平均年龄相对于务农人员要小很多且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务农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 40 岁左右，务农、兼业和务工劳动力平均年龄分别为 46.5 岁、39.7 岁、32.4 岁，务工人员平均年龄与务农人员相差超过 14 岁，与兼业人员相差超过 7 岁，且从已婚比例看，务工劳动力已婚比例仅为 64.48%，显著低于务农和兼业人员，这是否意味着年轻人更倾向与选择外出工作，中老年人更愿意选择留在本地工作呢？不同职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务农、兼业和务工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4.31 年、7.06 年、8.34 年，务工

① 工资收入为劳动者近 6 个月的平均月工资收入，如劳动者工作经历低于 6 个月，则取其从工作到接受访问期间的平均月工资收入。

和兼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务农人员,分别是务农人员的1.64倍和1.94倍,这能否表明受教育较高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非农职业呢? 此外男女性在三种职业的分布差异明显,表现为,女性主要集中在务农,男性劳动力主要集中兼业、务工。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三种劳动力配置方式,为多元离散型变量,故采用多元选择模型(Mlogit)对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MLogit模型中,农户劳动力选择某种配置方式的效用为:

$$u_{ij} = x_{ij}B + \varepsilon_{ij} = v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u_{ij}表示农户劳动力i选择第j种配置方式时的效用,x_{ij}表示影响农户劳动力i选择j配置方式的因素。且本文的研究结果必须满足:

$$p(u_{ij} > u_{ik}) \quad k = 1,2,3 \quad k \neq j \quad (2)$$

即农户劳动力i选择第j种配置方式能达到效用最大。因此,假设配置方式y为农户劳动力i的选择,可以得到劳动力i选择j配置方式的概率为:

$$p(y_i = j) = \frac{e^{x_i B_j}}{\sum_{k=1}^{3} e^{x_i B_j}} \quad j = 1,2,3 \quad (3)$$

其中,表示农户劳动力i的估计解释变量,k为3种劳动力配置方式组成的选择集。

在实证分析中,以务农组为另外两种职业的对比组。利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三种职业选择,解释变量包括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两部分。本文中家庭禀赋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等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社会资本包含户主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人力资本包含家庭劳动力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技能;经济资本包含家庭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人均耐用品价值、住房面积、耕地面积。结构制约主要观察样本居住模式、学生数、家庭赡养压力、家庭非健康人口、劳动力数、劳动力占比、务工人员占劳比等,这些因素有助于较为全面地考察农户家庭现状。本文以其他家庭为参照,考察了各类居住类型对于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见表3)。

表3 变量选择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工作类型	务农=1,兼业=2,务工=3	1.90	0.94
解释变量			
家庭禀赋			
社会资本			
户主为党员	户主为党员=1,户主非党员=0	0.09	0.29
户主为干部	户主为干部=1,户主非干部=0	0.01	0.12
家中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	家庭成员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1,家庭成员不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0	0.05	0.21
有城镇亲友并得到帮助	有无亲戚朋友在城镇工作并给予帮助:有=1,无=0	0.44	0.50
人力资本			
劳均年龄	家庭劳均年龄	40.20	12.47
劳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劳均受教育年限	6.20	4.57
劳均健康状况	家庭劳均健康状况	0.83	0.37
技能状况	家庭中有专业技能成员;有=1,无=0	0.06	0.24

经济资本			
住房面积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连续变量：平方米	19.63	12.55
耕地面积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连续变量：亩	2.13	2.19
耐用性资产价值	家庭人均耐用性资产价值，连续变量：元	2156.78	6481.38
生产性资产价值	家庭人均生产性资产价值，连续变量：元	1250.31	2771.23
结构制约			
居住安排			
仅与配偶居住	仅与配偶居住 =1，非仅与配偶居住 =0	0.03	0.16
核心家庭	是核心家庭 =1，非核心家庭 =0	0.34	0.48
主干家庭	是主干家庭 =1，非主干家庭 =0	0.52	0.50
其他家庭	是其他家庭 =1，非其他家庭 =0	0.11	0.31
家庭结构			
家庭学生数	家庭正在接受教育的学生数：人	0.80	0.91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同住人口数：人	4.82	1.47
劳动力占比	家庭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例（%）	0.72	0.25
务工人数占劳比	家庭务工人员数占劳动力数的比例（%）	0.38	0.36
家庭赡养负担	家庭人口总数与就业人口比例（%）	1.57	0.66
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	家庭非健康人口数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例（%）	0.03	0.09

四、家庭禀赋与结构制约下的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

在估计模型之前，检验各变量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0，均值为 1.56，故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计算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以确保消除数据存在异方差带来的影响。表 4 报告了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采用逐步加入两个维度的解释变量的方式分别进行回归，确保模型的稳健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禀赋、结构制约对贫困农村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且家庭禀赋、结构制约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并非单一的抑制或促进，而是具有正反双向影响。在家庭禀赋中，人力资本正向促进劳动者选择非农职业，而社会资本中家庭有城镇亲友并能得到帮助时对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家庭成员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仅对劳动力务工就业有显著影响，经济资本虽有影响，但系数接近 0 故而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在结构制约中，居住安排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非农资源配置选择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结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有双向影响。

表 4　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劳动力分配的影响

变量	兼业		务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家庭禀赋				
社会资本				
户主为党员	0.070	0.092	0.022	0.132
	(0.178)	(0.197)	(0.129)	(0.172)
户主为干部	−0.525	−0.554	−0.202	0.009
	(0.478)	(0.499)	(0.302)	(0.348)
家庭中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	−0.082	−0.314	0.425**	0.460**
	(0.274)	(0.302)	(0.181)	(0.232)

有城镇亲友并得到帮助	0.286***	0.190*	0.469***	0.270***
	(0.107)	(0.109)	(0.071)	(0.084)
人力资本				
年龄	−0.020**	−0.036***	−0.063***	−0.050***
	(0.008)	(0.009)	(0.006)	(0.008)
受教育年限	0.058***	0.074***	0.049***	0.057***
	(0.017)	(0.018)	(0.012)	(0.015)
健康状况	0.675***	0.631***	0.615***	0.715***
	(0.224)	(0.245)	(0.142)	(0.191)
专业技能	0.156	0.059***	0.132	−0.087
	(0.145)	(0.151)	(0.098)	(0.120)
经济资本				
住房面积	−0.001	−0.001	2.316×10^{-4}	−0.004
	(0.004)	(0.004)	(0.003)	(0.004)
耕地面积	−0.034	−0.035	−0.049***	−0.022
	(0.024)	(0.026)	(0.018)	(0.022)
耐用品价值	2.440×10^{-5}**	2.620×10^{-5}**	1.390×10^{-5}	1.260×10^{-5}
	(9.81×10^{-6})	(1.08×10^{-5})	(8.79×10^{-6})	(9.72×10^{-6})
生产性资料价值	2.510×10^{-5}*	2.420×10^{-5}*	-5.850×10^{-5}***	-4.960×10^{-5}***
	(1.33×10^{-5})	(1.37×10^{-5})	(1.89×10^{-5})	(1.92×10^{-5})
结构制约				
居住安排				
仅与配偶居住		−0.540		−0.840**
		(0.454)		(0.398)
核心家庭		−0.470**		−0.568***
		(0.221)		(0.185)
主干家庭		−0.043		−0.129
		(0.186)		(0.142)
家庭结构				
家庭学生数		0.372***		0.443***
		(0.071)		(0.065)
家庭人口总数		−0.207***		−0.328***
		(0.056)		(0.050)
劳动力占比		1.122***		1.879***
		(0.105)		(0.083)
务工占劳比		0.130		4.370***
		(0.276)		(0.268)
家庭赡养系数		−0.217**		−0.323***
		(0.118)		(0.108)
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		−1.615***		−1.041**
		(0.555)		(0.464)
常数项	−1.688***	−0.768	1.328***	−0.700
	(0.425)	(0.675)	(0.271)	(0.570)
伪 R2	0.0465	0.2519	0.0465	0.2519
样本量	4223	4223	4223	4223
Wald	344.85	870.87	344.85	870.87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一）家庭禀赋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人力资本正向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具体表现为：劳均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健康状况越好、具有专业技能的家庭其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这是因为，受教育年限越长则此人的文化水平越高，一般而言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可以较快接受新的事物，适应新的环境，且从收入来看，非农职业工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业收入，模型中务工、兼业系数分别为 0.074 和 0.057 且都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务工小于兼业。健康状况较差的劳动力相较于健康的劳动力而言，自身可接受的劳动强度和支出的劳动时间都低于健康劳动力，故而寻求非农职业难度较大，因此健康程度较差的劳动力会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模型中表现为：在 1% 显著水平下务工系数为 0.715 高于兼业系数 0.631。劳动力越是年轻其选择非农职业的倾向越大，模型中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务工系数为 -0.050 小于兼业系数 -0.036，也表明年龄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的影响要高于对劳动力资源兼业配置的影响。家庭劳动力中具有专业技能的成员对家庭劳动力兼业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家庭依据个体比较优势进行内部分工时，家庭劳动力分工深化，更倾向让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以增加家庭收入，而让其他成员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综上，家庭人力资本越好越能促进劳动力非农资源配置且对劳动力务工职业选择影响更大。

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更能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有城镇亲友并能得到帮助对农户劳动力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选择务工的影响更大，不仅在显著水平上务工高于兼业，且务工系数为 0.270 高于兼业 0.190，这可能是由于家庭有城镇亲友并能得到帮助时，亲友会尽可能帮助劳动力获得一份非农工作且劳动力自身也会尽可能地选择外出务工；家庭成员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劳动力选择务工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 0.483，对劳动力选择兼业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当某个家庭成员处于较好的社会阶层时，其可以利用自己的良好的人际网络关系帮助家庭劳动力成员获得一份务工工作。

经济资本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有显著影响但系数很小。虽然经济资本中生产性资料价值在 5% 的显著水平对劳动力资源兼业配置有正向影响，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但其系数接近于 0，故而我们认为生产性资料价值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无显著影响。同样，由于耐用品价值系数接近于 0，我们也认为耐用品价值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无显著影响。耕地面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无显著影响。

（二）结构制约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家庭学生数与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学生数对劳动力选择非农职业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有影响且务工系数为 0.443，兼业系数为 0.372，这是因为随着寄宿学校的增多，学生大都寄宿在学校，此时学校为家庭分担了很大照料责任，且家庭学生数越多意味着现有开支（或者“潜在开支”）较大，较轻的子女照料压力与较大的开支压力都使得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收入较高的务工职业；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选择非农职业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有影响且务工系数为 1.879，兼业系数为 1.122，这是因为劳动力占比越高不仅意味着家庭劳动力越多，也意味着家庭中需要照料的人员越少即较轻的家庭负担，这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尽可能地寻求一份高收入工作（一般为务工）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点由务工系数大于兼业可以证明。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外出务工者在工作地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了亲友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并帮助亲友快速找到一份可靠的工作，务工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 4.370，这意味着家庭务工人员越多家庭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倾向越大。

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总人口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家庭同住人口越多，需

要照料的人越多,家庭赡养负担越重,劳动力难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家庭赡养系数对务工职业选择在1%的显著水平下、兼业职业在5%的显著水平下有影响,这是因为当家庭需要照料的人员比例较高时,就需要家庭部分劳动力放弃外出就业的机会而选择在家照料"弱势成员"并兼顾农业生产,且家庭赡养压力越大劳动力倾向不选择务工,这一点从务工系数为-0.323绝对值大于兼业系数-0.217中可以得到证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务工、兼业配置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有影响,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越高,就意味着需要越多的家庭成员承担照料弱势成员的家庭义务,且非健康人口越多越可能占用劳动力资源。

居住安排方面,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资源务农配置有显著负向影响。实证结果与假设相反,对此从家庭劳均年龄与家庭实际照料压力进一步探讨。从表5中可以看到,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劳均年龄为53.49高于其他三种家庭约25%。且仅与配偶居住家庭中,劳均年龄55岁以上家庭占比为48.21%,而其他三种家庭最高的仅为5.07%,以上表明仅与配偶居住的家庭劳动力年龄较大,而较大年龄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能够选择的职业有限,且由于年龄较高而不易被劳动力市场接受,这些都不利于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劳动力获得一份务工工作。核心家庭中需要占用劳动力的家庭有248户,比重为43.28%,而主干家庭、其他家庭与仅与配偶居住家庭比重为38.31%和39.16%,分别低于核心家庭4.97%、4.12%。这表明现实情况中,核心家庭中劳动力的实际照料压力要高于其他类型家庭,这很好地解释了模型分析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的负面影响的原因,即核心家庭对子女、老人和家庭非健康成员的照料责任制约着家庭劳动力的职业选择,从而降低了劳动力非农配置的可能性。

表5 各家庭居住模式下劳动力实际照料压力

居住模式	劳均年龄(岁)	劳均年龄55岁以上家庭占比(%)	有需劳动力照料的儿童(户)	有需劳动力照料的老人(户)	有需劳动力照料的其他人员①(户)	需占用劳动力的家庭比例(%)
仅与配偶居住	53.49	48.21	—	16	2	13.3
核心家庭	39.65	0.87	172	21	55	43.28
主干家庭	40.08	1.10	209	55	13	38.31
其他家庭	39.74	5.07	44	8	4	39.16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于2017年在甘肃省片区贫困县进行的农村社会调查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家庭禀赋、结构制约对贫困农村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通过以上模型及计量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简要结论:一从家庭禀赋看,农户良好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劳动力务工配置影响高于兼业。从影响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具体因素来看,在家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中,人力资本因素最为关键,尤其是健康状况与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其劳动力更倾向于配置到非农部门。二从结构制约看,农户家庭结构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影响,但并非单一的抑制或促进,且家庭结构对劳动力务工配置的影响同样高于兼业;居住安排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影响。在结构制约的诸多因素中,务工占劳比对劳动

① 其他人员指除老人和孩童的非健康人员

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影响，且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却对劳动力兼业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差异表明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历与在工作地所建立的社会网络，较大的降低了劳动力外出就业成本与风险，对家庭其他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而务工占劳比越高的家庭其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劳动力的较高的年龄是限制其务工就业重要因素，核心家庭的劳动力实际照料压力较高，劳动力实际照料压力越小的家庭其劳动力越倾向于配置到非农部门。

结合当前贫困农村劳动力配置现状，提出一下几点建议：(1)提升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总福利的关键。现实中，受教育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是贫困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故当地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力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可以通过政府信用建立劳动力—政府—企业三方联系平台，帮助农村劳动力沟通供求信息，能有效降低劳动力求职成本，帮助劳动力走出农村脱离农业。(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家庭的赡养负担与照料压力是制约农户劳动力非农配置的重要因素，加强农村养老院建设，采用集中赡养方式，强化公共医疗服务可以有效减轻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赡养、照料负担与心理压力，有助农户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

参考文献：

[1]蔡昉，张车伟.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5－76.

[2]ZHANG X，YANG J，WANG S.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4)：542－554.

[3]冷智花，付畅俭，许先普. 家庭收入结构、收入差距与土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微观分析[J]. 经济评论，2015(5)：111－128.

[4]张清津. 农村分工深化与社会结构变迁[J]. 理论学刊，2014(12)：68－75.

[5]STARK O，TAYLOR J 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igration：theor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R]. World Bank，1991：20－25.

[6]FAFCHAMPS M，QUISUMBING A. Human capital，productivity，and labor allocation in rural Pakistan[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9，34(2)：369－406.

[7]张成甦，宋山梅.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1)：92－99.

[8]FARIDI M，BASIT A. Factors determining rural labour supply：A micro analysis[J]. Pakistan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2011，49(1)：91－108.

[9]BAGAMBA F，BURGER K，KUYVENHOVEN A. Determinant of smallholder farmer labor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Uganda[R].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09.

[10]盛来运.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07(3)：2－15，80.

[11]邱元，叶春辉，朱奇彪，等.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以全国 5 省大样本调研数据为例[J]. 浙江农业学报，2015，27(2)：295－300.

[12]杨云彦，石智雷.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08(5)：66－72，96.

[13]薛福根，石智雷. 个人素质、家庭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3(8)：110－112.

[14]马小勇. 家庭禀赋、个人特征与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J]. 贵州社会科学，2017(10)：146－155.

[15]朱慧劼.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6)：175－181.

[16]REARDON T，BERDEGURE J，ESCOBAR G. Rural nonfarm employment and incomes in Latin America：overview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World Development，2001，29(3)：395－409.

[17]YUNEZ－NAUDE A，TAYLOR J. The determinants of nonfarm activities and incom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exico，

with emphasis on education[J]. World Development,2001,29(3): 561 - 572.
[18]陈风波,丁士军,Henry Lucas. 家庭结构、重大疾病和农村劳动力迁移[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3):34 - 44.
[19]程璆,郑逸芳,许佳贤. 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 劳动经济研究,2017,5(2):80 - 95.
[20]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等. 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 经济研究,2004(12):85 - 95,122.
[21]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2012,27(3):157 - 181,245.
[22]吴愈晓,王鹏,黄超. 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J]. 社会学研究,2015,30(6):122 - 144,244 - 245.
[23]张旭晨.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社会融入政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3):98 - 103.
[24]刘靖. 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08,43(9):136 - 149.
[25]SUN J. Chinese older adults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productive aging[J]. Ageing International,2013,38(1): 58 - 70.
[26]周春芳. 儿童看护、老人照料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J]. 农业技术经济,2013(11):94 - 102.

Endowment, Structural Restriction and Labor Resource Allocation of Farmers in Poor Areas

ZHANG Yong-li, GUO Shi-hui
(*College of Busine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 on rural social survey data conducted in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of Gansu Province in 2017 by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Gansu Province, the Mlogit model wa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allocation of farmer labor resourc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agriculture, concurrent employment and migrant employ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family endowment,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can promote the non-agricultural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he nuclear famil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on-agricultural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employment configur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living with the spouse only for the labor force.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and labor in the family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on-agricultural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while the burden of family support and the proportion of non-healthy people in the fami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on-agricultural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rural social public security.

Key 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s; family endowm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labor force; resource allocation